

台灣與「新」南向：一個經濟史的探討*

林欽明
淡江大學

2018 年 11 月

當今的政府提出了「新南向」政策，我們自然會想到，那不是就應該有「舊南向」政策？甚麼是舊南向政策呢？是 1990 年代當時所推出的「南向」政策嗎？還是我們應該追溯到更久遠之前呢？最近中國因美國積極介入南海的爭議，而意圖聯合東南亞一些國家對美國予以反制，這讓人想起近幾世紀西方列強東來的歷史情仇？還是二次世界大戰中美聯手抗日情勢的反轉呢？

Michael Auslin 將南海比喻為亞洲地中海，指出印太區域目前所面臨的地緣政治危機，並建議比照歷史上歐洲地中海所發生的東西對抗時各方所採取的策略，來因應此一危機。¹亞洲地中海的比喻在過去幾十年來有甚多的論辯，正反意見各異，而最近則在經濟史界又興起另一波的爭論熱潮。²本文擬從這些論辯出發，追溯歷史上在亞洲地中海的南向進程，以釐清前面提及的是否有「舊南向」，以及甚麼是「舊南向」的問題。

首先我們探究亞洲地中海出現的時代背景，以及我們該從甚麼樣的面向來看待它。接著我們討論在貿商世紀(age of Commerce)裡，甚麼才是最重要的探討對象，而在這樣的討論裡，又會碰到甚麼樣的困難。在第三節裡，我們略論東南亞之成為一區域的標準何在，此區域的特質為何，而台灣與此區域的關聯何在，並具有哪些相同的特質。在第四節，我們點出台灣在亞洲地中海南向趨勢裡所居的地位，以及台灣融入此趨勢的演變過程。最後為初步的結論。

¹ Michael Auslin, "Asia's Mediterranean: Strategy, Geopolitics, and Risk in the Seas of Indo-Pacific," *War on the Rocks*, February 29, 2016.

² 尤其見 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540-1680*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raig J. Reynolds, "A New Look at Old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4(2) (May 1995), pp. 419-46; Denys Lombard, "Networks and Synchronisms i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6(1) (March 1995), pp. 10-16; Denys Lombard, *Le carrefour javanais: Essai d'histoire globale*, 3 vols. (Paris: Ecole des Haut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90); Oliver W. Wolters, *History, Culture, and Regio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1999); Roderick Ptak,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Asian Mediterranean'," *Archipel* 55 (1998), pp. 11-14; Claude Guillot, Denys Lombard and Roderick Ptak, eds.,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China Sea: Miscellaneous Note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8); "L'horizon nousantarien: Mélanges en hommage à Denys Lombard," vol. 1, *Archipel* 56 (1998), pp. 21-43; Bin Wong, "Entre monde et nation: les régions Braudéliennes en Asie" *Annales HSS*,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1), pp. 5-41; Roderick Ptak,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Historical Interactions," *Archipel* 62 (2001), pp. 3-5; Pierre-Yves Manguin, *Les Portugais sur les côtes du Vietnam et du Campa: Etude sur les routes maritimes et l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d'après les sources portugaises* (XVIe, XVIIe, XVIIIe siècle) (Paris: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72).

亞洲地中海

在東西發展史上，有一個令人非常不解的疑惑之處，那就是，為何在歐亞大陸的兩端，歐洲大部時候都處於分崩離析的狀態，而亞洲東方的中國，卻一直都維持著完整的政治實體？我們應該會想要反問，兩邊不都可能發展出完全相反的情況嗎？換言之，為何歐亞大陸的一端會出現各種氏族、王國、政體的演化競爭，而在幾乎相同大小的另一端，卻能安然無恙地發展成一完整的帝國？

部分的解釋也許是與十一世紀時，歐陽修和司馬光對後世影響深遠的中國歷史觀有關。宋太祖趙匡胤在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南征北伐建立宋朝後，為永久擺脫唐末五代的分裂與動盪，乃崇文尚儒、激勵臣下忠君。³北宋「春秋學」著重尊王、大一統的觀念，突破墨守章句、疏不破注的經學藩籬，歐陽修是其典範。⁴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則更奠下中國史學深厚的基礎，他並非沒看到宋帝國的種種弊病，也非反對改革，只是他認為不必大動干戈地折騰。他把帝國比喻成一個老房子，雖然牆壁、屋頂破損，但梁柱沒有壞，可以一點點修補，不能拆掉重建。

5

宋朝於西元十世紀末，在歷經中原一世紀的混沌動盪後興起。此混沌動盪正好與此新統一的帝國形成一強烈對比，是一個政治的結果。而當該混沌動盪逐漸成為歷史記憶時，完整國家的圖象乃逐漸烙印在人們的理念認知裡，這就是常被人稱頌的「中國性」(Chinese-ness)。這裡，我們忽視了一個重要的事實：至少直到隋唐之前，所謂完整的中國是不存在的，是非常態的。而即使在隋唐時期，所謂完整的帝國，也只是覆蓋在複雜現實上的一個表象而已。⁶誠如 Hugh Clark 有點譏諷地說，他在福建莆田看到一株年代久遠的荔枝樹，當地學者向他誇耀，那是唐朝皇上所賞賜。⁷Clark 是多年研究福建的學者，讓他感到震驚的是，直到今天當地人還是堅信這棵樹顯現了「中國」以及「中國的」歷史之文化完整性。當地學者似乎相信福建早在唐代即已被大「中國」所融合，受到中國文明的影響，這棵樹就是一個明證；而實際上，早在唐之前，漢人即已移居至福建。⁸

學者們已經從中國廣袤的考古資料發現，我們今天所稱的「中華」文化，實際上

³ 譬如見顧吉辰，〈宋太祖加強中央權威的舉措〉，《學術月刊》，期 7 (1995)，頁 45-51。

⁴ 葉泉宏，〈歐陽修史學探微：以《新唐書》本紀論贊為核心〉

(http://ir.lib.au.edu.tw/bitstream/987654321/2223/1/CT01-pa200407_ye_01.pdf)，頁 6。

⁵ 文史砍柴，〈司馬光的悲劇：史學家的話總不如文學家的話中聽〉，Views, 22 (2017.11.19) (<https://hk.saowen.com/a/18422b0d6ed7f552ddc486d4fa7ffcc9d74cc783ef2aceaa17b9c5c102ed78b1>)。

⁶ 譬如見 Hugh R. Clark, *The Sinitic Encounter with Southeast China through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6)。

⁷ 我岳母也曾驕傲地向我提及這棵樹，她老鄉就是莆田。

⁸ Hugh R. Clark, "What's the Matter with 'China'? A Critique of Teleological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7(2) (May 2018), p. 298.

是集合眾多不同的遠古文化而成。⁹然而，不論在中國或外國的漢學研究，還是將今天完整的中國視為歷史論述的自然結果。費正清、Jacques Gernet 等人的經典教科書，¹⁰以及較近如 Patricia Ebrey 的著作，¹¹都在全世界被廣為使用。而像是王賡武(Wang Gungwu)在最近發行修訂版原題名為 *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關於十世紀中國北方政權的經典研究，修訂版改名為 *Divided China: Preparing for Reunification, 883-947*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07)的序言裡亦寫道：「統一的中國是常態，分割的時期並不正常...。」¹²簡言之，他們這些觀點都在辯稱，歷史力量將東亞導向我們今天以及過去幾世紀來所看到的現狀，所以像歐洲那樣的多國並存狀態，是極端不可能出現的。

這就如同十四世紀以來各國對中國的朝貢貿易(tributary trade)一樣，都是中國中心論(Sinocentrism)下的產物。然而近幾年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對此提出質疑。他們指出，如果海洋占了地球表面近四分之三的話，那麼以中國中原為主的陸地地區，是不可能成為歷史發展的重心的。而且，歐亞大陸東南地區除了中國之外，還有日韓以及東南亞許多重要的國家，人類的生活脫離不了貿易，貿易的進展則脫離不了海洋。所以，東亞歷史的發展，並不是以中國為中心，而應該是以與東亞大陸相關聯的海洋為中心。

西元十世紀時，不只已有大量的漢人南移至閩廣，而且他們也明顯具有獨立經濟的特性，因為史學家所稱的商貿時代(age of commerce)已經來臨。當時以阿拉伯以及印度商人為中介往返東亞與歐洲之間，促進了東西貿易的興盛。海洋東南亞王國像是三佛齊(Srivijaya)和後來的馬六甲蘇丹王朝(Malacca Sultanate)，都因位居航運中點而大為興盛。而當時在泉州的獨立統治者也為了鞏固其地位，亦盡力推廣貿易。結果，到了 978 年時透過該府所從事的貿易已經遠遠超越了它在九世紀的成就，而泉州府也因此帶領宋朝達到十二至十三世紀經濟繁榮的高峰。¹³

在九世紀末和十世紀初，華商開始進入原為阿拉伯人所掌控的南洋貿易航線，¹⁴

⁹ 張光直的《古代中國考古學》[Kwang-chih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4th ed.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仍是最具影響力的調查研究之一。較近者另見 Charles Holcombe, *A History of East Asi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Valerie Hansen, *The Open Empire: A History of China to 1800*, 2nd ed. (New York: W.W. Norton, 2015).

¹⁰ Edwin Reinschauer,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Craig,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Mifflin, 1960); Jacques Gernet,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¹¹ Patricia Buckley Ebrey,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¹² P. ix.

¹³ Hugh R. Clark, "Quanzhou (Fujian) During the Tang-Song Interregnum, 879-978,"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68(1/3) (1982), pp. 147-48.

¹⁴ 森克己，《日宋貿易の研究》(東京：国立書院，1948)，頁 60-68。

而這些勇於投入其間者有許多來自泉州，一旦成功即可獲得龐大利益。故而當時泉州商人累積了大量財富，也促使泉州府蓬勃發展，成為當時全中國最大與最富有的城市。這當然也為當地仕紳帶來商機，從八、九世紀直至十一世紀，地方官員從商人的賄賂和關稅課扣取得大筆金錢。¹⁵

隨著商貿時代的來臨，東亞地區也形成了一個新的經濟區，此經濟區不受國界或中國、韓國、日本以及東南亞諸國等國家團體所侷限，而是一個海洋走廊，北從海森威南至新加坡，包含了各個國家的某些部分，而逐漸形成它自己的法律和企業經營體系。此海洋走廊聯結日本海、黃海、南海、蘇祿海(Sulu Sea)以及西里伯斯海(Celebes Sea)，通常被稱為亞洲地中海(Asian Mediterranean)，最早是由 Georges Coedès 於 1944 年探討被印度教所滲入的印支半島和印度尼西亞各國所提出的一個概念：

在馬來半島和群島等天然島礁的另一側，有一個由中國海、暹羅灣和爪哇海所形成的地中海。雖然遭到颱風肆虐以及礁岩阻隔，這個內海長期為居住在沿岸的人民提供一個連結，而非阻礙。遠在歐洲探險者來到之前，這些居民有他們自己的船隊，而且雖然各有他們自己的祖先，但經由持續彼此交易，他們已經發展成某種文化群體。¹⁶

此地中海可以被同時視為一個海洋空間、貿易交叉點，以及不同文明間的連結，他也可被視為一跨國空間，其中若干自主城市和都會區聯合控制產品和金錢的流通，共同形成一個經濟統治區塊。我們在這個單一的海洋空間裡目睹了各個不同的政治個體，以及他們彼此間的經濟關係，在十六至十九世紀間，他們有著差異甚大的發展歷程，並彼此競爭與兼併。這些關係很難以世界體系理論的軸心與邊緣來加以解釋，誠如 Subrahmanyam 所指出，他們並不是一種機械式的性質，而是一個異質性和動態的經濟空間。¹⁷

就某些程度而言，Pierre-Yves Manguin 和 Anthony Reid 也都曾將亞洲套用地中海的比喻。¹⁸Denys Lombard 在他的巨作裡，更生動的描繪與分析穿過南中國海的

¹⁵ 這是 Hugh Clark 的推測，他從《新唐書》裡有關李勉和王鐸的記載，發現這些捐紓在廣州官府極為普遍，而由於泉州並無貿易監管官員，雖然貿易量較小，但科扣的機會明顯更大。泉州司法督察杜舜的銘文裡明顯記載，地方官員通常將關稅收入的 10% 納入自己口袋做為私用，就可見一斑了。

¹⁶ Georges Coedès, *Les états hindouisés d'Indochine et d'Indonésie* (Paris: De Boccard, 1944), p. 16; 轉引自 Francois Gipouloux, *The Asian Mediterranean: Port Cities and Trading Networks in China,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13th–21st Century* (London: Edward Elgar, 2011), p. 7.

¹⁷ Sanjay Subrahmanyam, "Notes on Circulation and Asymmetry in Two 'Mediterraneans', 1400-1800", in Claude Gillot, Denys Lombard and Roderick Ptak, eds.,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China Sea*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9), pp. 21-43.

¹⁸ 見 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540-1680*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ierre-Yves Manguin, *Les Portugais sur les côtes du Vietnam et du Campa: Etude sur les routes maritimes et l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d'après les sources portugaises* (XVIe, XVIIe, XVIIIe siècle) (Par-

航道以及環繞印尼列島的海洋。¹⁹這個關於從南中國海延伸至孟加拉灣之航道的說法，遭到許多近代學者的質疑。²⁰另一方面，有些經濟史學者則將該說法做了更大幅的擴大，雖說並未提及研究地中海史的大師 **Fernand Braudel**。²¹譬如濱下武志和川勝平太呈現了 16 至 18 世紀第一個經濟全球化下，亞洲海洋活動的面貌。

22

不過，真正把 **Braudel** 的概念架構發揮得淋漓盡致的應屬 **K.N. Chaudhuri**。²³他指出，環繞印度洋之土地上的物質和人文的結合，賦與該區域一種凝聚性，而此凝聚性更因海運與文化的關係而愈趨鞏固。**Chaudhuri** 應用了 **Braudel** 之史學研究的三大支柱：空間、時間和結構，他以跨越十一個世紀的時間軸來探究印度洋，毅然拋開歐洲中心的觀點，將亞洲做為單一個體來加以檢視，指出該區域的貿易完全為市場所驅使，而不是像 **Polanyi** 所想的是「鑲嵌」於政治和文化裡。他也採用 **Braudel** 的長期史觀(*longue durée*)，也就是不論歷史上有何政治變遷和事件的發生，經濟和社會生活結構的方式是不變的。他並將對海洋的社會態度、土地與海洋的關係、都市化的角色，以及亞洲之戰爭和饑荒的重要性，插入到 **Braudel** 的觀點裡。

姑不論亞洲地中海的論點遭到多少正反的批評，我們只要不受地理決定論的有限，²⁴或堅持歷史的序列性，那麼 **Braudel** 對地中海的詮釋還是可以應用到亞洲來。**Braudel** 對地中海海洋空間的研究最主要的發現，是它打破了國家之間的界線，從流動來界定空間本身，並將不同的時間段落相互映照。此外，**Braudel** 並打破了中心與邊緣之間的藩籬，打開了既定的政治邊界，並特別強調一個純粹由政治所區隔的世界是可以被穿透的。所謂一個完整與統一的中國，只是一種迷思，閩廣乃至於台灣，從文化與經濟社會層面而言，也許更接近東南亞各國，而非中國的中原。

國家區域與經濟區域的分野

然而，當我們看著東亞的地圖時，我們看到的是國家以及其下所畫分的省、縣和

is: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72).

¹⁹ Denys Lombard, *Le carrefour javanais: Essai d'histoire globale*, 3 vols. (Paris: Ecole des Haut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90).

²⁰ 譬如見 Pierre-Yves Manguin, "Trading Ship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36(3) (August 1993), p. 253.

²¹ **Braudel** 的代表作為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3 vols. (originally appeared in 1949; revised several times).

²² 濱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1997)；川勝平太，《文明の海洋史観》(東京：中央公論社，1997)。

²³ **K.N. Chaudhuri**, *Asia Before Europe: Economy and Civilization of the Indian Ocean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²⁴ 見 **Martin W. Lewis and Karen E. Wigen**, *The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鄉鎮。我們將如何觀察這些不同個體間的互動呢？包括它們的經濟交易，以及他們在資訊與資本上的移動。各個國家所設計的統計工具雖然各有不同的定義，但畢竟可以讓我們清楚正確掌握其產品與服務的交易狀況(如果我們可以假設走私和未記錄的貿易量是微不足道的話)，還有他們之間資本的流動情形。不過若牽涉到資訊流動或人口的移動，那麼情況則較不確定。譬如說，實際從事交易者並不是中國和日本，而是某些特定的企業，而這些企業也不是分布在任何地方，而是某個特定地區。接受日本投資者並不是中國，而是位於某特定地區的中國企業。

若如是，我們這裡將面對了一個真正的難題：如果統計工具是針對國家領域所設計，那麼我們將如何知道某個特定地區真正的貿易移動量呢？一個特定地區，不管是在某國家空間之內，或是一個跨越數國的區域，或只是一個城市，又如何將國家特定部分的貿易量歸屬到它身上呢？誠如 **Jane Jacobs** 所言，國家是政治和軍事個體，國家團體也是一樣。不過這不當然表示他們就是經濟生活的基本單位，可以被用來探究經濟結構的底細、財富的興衰，等等。我們也很難想像，將新加坡與美國，或厄瓜多和蘇聯，或荷蘭和加拿大等個別的國家做為公約數，因為他們實際上真正共有的特質，只是其主權而已。²⁵所以，甚麼才是分析經濟現象最適當的衡量呢？**Jane Jacobs** 稱這個問題為「重商主義形式邏輯」(**mercantilist tautology**)，也就是說，只有國家經濟才能提供總體經濟分析的基本資料。這個假設已經有四個世紀之久，早期的重商主義經濟學家鑑於當時葡萄牙、西班牙、法國、英國以及荷蘭等歐洲霸權，為了探索並征服新世界而相互對抗，這也是他們了解財富本身的關鍵因素，以及它是怎麼上昇、如何維持，以及是怎麼消失的。²⁶**Adam Smith** 雖然拒斥了若干重商主義者的基本假設，但他還是無法避免將國民生產總額(**GNP**)定義為一國勞工的總生產所得，或以該所得從國外所購入者。²⁷

由上所述，我們發現，國還是唯一被納入考量者，並經常被假設為同質的，然而，經濟上來說，他們實際上是不同的、是異質的。這並不是因為他們領土分布的廣闊，而是因為其交流和貿易網絡之密度的差異，以及其各個聚集中心所形成之虛擬空間，各有其吸引人之處、連結、中心和邊陲。當我們處理包含不同國家部分領土的跨國經濟區域時，像是 **Braudel** 所探討的地中海，或是 **Denys Lombard** 所探討的十八世紀之南海，²⁸也都一樣。

在都市的情形也沒有甚麼不同。真正說來，都市是經濟生活的生產單位，企業、技術、資本和市場都集中在都市裡。都市是農業生產力成長，以及發展更為成熟

²⁵ **Jane Jacobs**, *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5), pp. 31-32.

²⁶ **Jacobs**, *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pp. 29-30.

²⁷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Book One; 轉引自 **Jacobs**, *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pp. 30-31.

²⁸ **Lombard**, *Le carrefour javanais*.

之服務業最好機會的地方。都市促使社會移動的機會大增，透過其基礎建設，它擴大了影響圈，與其他都市相連結，並藉以建立其網絡。都市是人口、活動和能力交匯的地方，透過資訊的生產和分布，都市變得更為都會化，與其他都會中心相競爭。它是集合協調和創新的融會爐，而城際關係則導致交易的加強。

在一定的發展層級上，這些關係裡最重要的是都會區域之間，而非中心與(近或遠)邊陲之間結構的連結。在歐洲地中海發展高峰時期，熱那亞(Genoa)、威尼斯和呂北克(Lübeck)是全球權力的中心，具有較其所屬而並不依賴之王國遠為優越的影響力。今天，香港、新加坡等具商業與金融重要性的都會中心，都是將經濟重新組合成為具吸引中心點之網絡最佳的例證。目前在國際市場上競逐的並不是國，而是都市與企業。Paul Krugman 無疑是重新發現此經濟地理學最主要的貢獻者之一，他說：因為「在某些重要的事例裡，國際經濟學和區域經濟學之間的界線已經越來越模糊了。...當歐洲成為一整合的市場時，...我們如果還是以傳統的國際貿易典範來看待其個別成員之間的關係，那將是越來越無意義了。」²⁹

這當然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事，如前所述，當全球開始進入商貿世紀的時候，這種國與都市、國與企業之界線的模糊化，就已開始出現。所以，Jared Diamond 的推測說，明朝中國海權以及航海技術的衰落，是因中國朝廷兩派政治勢力的鬥爭，再加上政治的過度統一之故，³⁰是有待商榷的。他進一步宣稱，明朝皇帝的全面禁止船隻出海，造船塢毀損而致使該禁令無從反轉，是一大致命傷。政治分裂的歐洲反而取得優勢，伺機持續和擴大其海外的探險。義大利出生的哥倫布，在經過說服葡萄牙皇帝、麥迪納-西多尼亞公爵(Duke of Medina-Sedonia)、麥迪納賽利公爵(Count of Medinacelli)，以及一開始的西班牙國王與王后遭到拒絕後，第五度終於獲得後者的支持，得以向西探險。³¹Diamond 的推論是過度簡化了。

他的論點之一，也就是中國政治統一的集權化，最終阻礙了對長期海洋政策更廣泛的支持，也導致亞洲航海技術落後於西方。歐洲當時確實是分裂的，有著數百個宗主國，而哥倫布多方徵求說服以探險的故事也為真，不過，國的統一說，則是經不起歷史的驗證的。中國是較為統一並沒有錯，只不過，從西元前二世紀的秦國(短暫的)稱霸後即陷入紛爭，然後經過四世紀之漢朝文化的統一，又陷入將近四世紀的三國相爭。接著經過短暫的復合之後，又分裂為北方帝國(蒙古和突厥的入侵)以及南方(漢人)朝代。之後為隋唐從 589 到 907 年的再次統一，他們面對新興阿拉伯穆斯林的威脅。而在第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中國又陷入「五代」的紛爭。然後呢？宋朝歷經三世紀聚集了大部分(但非整個)的中國，隨後又從

²⁹ Paul Krugman, *Geography and Trade* (Cambridge: MIT Press, 1991), p. 8.

³⁰ 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7), p. 412.

³¹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pp. 413-16.

1279 到 1368 被元朝(蒙古)所統治，並大幅與外國以及西方直接接觸(包括有名的馬可波羅)。明朝從 1368 到 1644 年目睹大規模的印度洋海洋探索，日本對中國沿岸的掠奪，以及蒙古來自北方的壓力。所以在過去一千五百年的大部分期間，中國是明顯地缺乏統一。

而且，以中國的統一來代表東亞的統一，就好像以歐洲內部最強盛的帝國(譬如 16 世紀的西班牙)來代表歐洲的統一一樣，我們不要忘了其他的東亞強權，以及其他潛在或實際的海權國家。若以所知的海洋強權來說，過去幾世紀來就有不少。就在阿拉伯第一個派駐中國的大使(西元 651 年)後一個世紀，阿拉伯的船商們就已經強大到能夠於 758 年對廣東燒殺擄掠。³²大型波斯航海商船亦非常活躍—雖然在唐代期間，阿拉伯穆斯林推翻了波斯的祆教薩珊王朝(Sassanid)，但直到 12 世紀，波斯以及阿拉伯人仍掌控著印度洋。³³錫蘭的僧伽羅人(Singhalese)也活躍於海上貿易，在第八世紀時行駛 500 噸的大商船來到了中國南方，中國和安南(今天的越南)、韓國和日本艦隊也在數世紀裡發生大規模的海戰。這些國家之間進行過多次的朝貢貿易，對中國來說，它覺得受到尊崇而沾沾自喜，而對日本或錫蘭而言，那只不過是貿易的一種形式罷了。³⁴

所以，當時的東亞並不是以中國為中心、全都臣服於中國的大一統局勢。我們並不否認中國接連幾個世紀在東亞的霸權，只是，我們會懷疑憑著中國單一統治者的決策，就會決定整個東亞區域的航海貿易和技術發展。中國朝廷所下的一個命令，確實減緩了進展的速度，只不過，日本、韓國以及阿拉伯都有著跟歐洲之葡萄牙一樣的領土規模和能量，據有相同的邊陲地位。只要他們任何一個有長遠的政治決心，那麼從 15 世紀相同的起點，他們也何嘗沒有可能在航海技術和海外探索上，產生相同的進展呢！

台灣與東南亞經濟區域

對一個長期投入於東南亞研究的學者來說，他們最大的困擾是：東南亞可以被視為一個世界的區域嗎？換句話說，它是否具有和凝聚歐亞大陸其他地區一樣的歷史和文化連繫呢？相信許多人的答覆都是否定的。Victor Savage, Lily Kong and Brenda Yeoh 指責那些以十國政治來界定東南亞區域的地理學者，在他們眼中，「區域地理的基本原則被破壞了，一個區域不應該以其疆界，而是以及內涵的特

³² Louise Lavathes,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The Treasure Fleet of the Dragon Throne, 1405-143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57-66.

³³ Lavathes,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pp. 73-74.

³⁴ Michael Bosworth, "The Rise and Fall of 15th Century Chinese Seapower," Discussion in 'Interregnum & Aberration' Started by Tarakan (June 18, 2005)

(<https://militaryrevolution.s3.amazonaws.com/Primary%20sources/china.pdf>), p. 7.

定人格(personalities)來界定之。」³⁵那麼，東南亞可以如此界定嗎？

就大多數的標準而言，答案都是否定的。東南亞並不具有像歐洲、中東、南亞、東亞，甚至拉丁美洲一樣、根深蒂固、廣泛共有的宗教哲學體系，異言之，它的「高」文化傳統是多元與異質的，是從其他文明移入的。至少有四個世界區域的理念傳統匯入此地區，這包括南亞、東亞、西南亞和歐洲。就如同 Victor Lieberman 所言，「與歐洲或拉丁美洲或甚至南亞相較，[東南亞的分類]明顯是人為和剩餘(residual)的。」³⁶

東南亞文明的衍生性質源自於其本身的歷史。南亞的影響最早來到來半島，在西元前數世紀，大乘佛教和簡化的印度教(缺乏種性成分)從印度東來，進入人口較密集的區域。最後，除了峇里和龍目島外，印度教逐漸消失，不過在其他許多地方留下其思想和運作的痕跡。這隨後又被小乘佛教所淹沒取代，該佛教教義在斯里蘭卡發揚光大，並散布於伊洛瓦底三角洲的孟族(Mons)，在緬甸、泰國、寮國和柬埔寨亦建立了穩固的根基。

中國是該區域第二個主要的影響來源。越南從中國接受了大乘佛教、道教和儒教，它因高度漢化而被若干學者畫歸東亞。³⁷不過，特別是越南較南方地區，地方習俗則與漢人移入者混雜而形成較為「東南亞式」的文化，³⁸導致越南二分為南北文化，至今仍如是。中國文化的移入，隨後將東亞形態的思想推向東南亞中心地區，尤其是新加坡和其他主要都市地區。

東南亞所受第三個世界文明的影響來自西南亞。伊斯蘭被穆斯林商人帶進馬來半島和群島，以及陸地沿岸區域，在 1250 到 1650 年期間，逐漸取代了印度教和佛

³⁵ Victor Savage, Lily Kong and Brenda S.A. Yeoh, "The Human Geography of Southeast Asia: An Analysis of Post-War Developments," *Singapor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14(2) (December 1993), p. 233.

³⁶ Victor Lieberman, "Local Integration and Eurasian Analogies: Structuring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Modern Asian Studies*, 27(3) (July 1993), p. 476. 印度學者 D.R. Sadesai 更進一步宣稱，「東南亞區域從宗教、歷史、地理或族群各層面來說都不是單一個體」，而應分為四個特定區域：印尼-馬來西亞、小乘佛教區、越南，和菲律賓。見 D.R. Sadesai, *Southeast Asia: Past and Present* (New Delhi: Vikas, 1981), p. 4.

³⁷ 中國文化形態在近代之前的越南菁英階層極為普及，他們「承襲了對古典中國文明的崇拜，並視許多地方文化面向為『野蠻』」。同時，「其朝廷官話為中文，相對來說越南方言則被視為是『粗俗和不足』的」。見 David E.F. Henley, "Ethnogeographic Integration and Exclusion in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Indonesia and Indochin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7(2) (April 1995), p. 299.

³⁸ 見 Keith Taylor, "Nguyen Hoang and the Beginning of Vietnam's Southward Expansion," in Anthony Reid, ed., *Southeast Asia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Trade, Power and Belief*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45. Donald Emmerson 指出，越南人他們自己近幾年來非常強調其東南亞根源以及關連，見 Donald K. Emmerson, "Southeast Asia: What's in a Nam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5(1) (March 1984), pp. 1-21. 而 Reid 則顯示，儒教的理念並未穩固深植於越南，見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540-1680*, Vol. I, *The Lands below the Winds*, p. 135.

教，並於該期間較後部分密集廣布於該地區。³⁹在某些地區，像是蘇門答臘北部，則見到了相對較「純」的伊斯蘭根基，而其他地方，像是爪哇中部和東部，則出現了較為混雜的宗教形態。伊斯蘭在西班牙人來到菲律賓時迅速在當地蔓延，不過其進展很快就被遏止。今天，只剩下該群島西南端一小部分地區還篤信該宗教，其他大部分地區則受到歐洲的影響，基本上為基督教化並部分西班牙化了。⁴⁰

因逐步接受了外來在宗教領域(以及其他政治和文學文化層次)的影響，加上它複雜的傳統拼湊，東南亞並不是一個統一的文化個體。另一方面，散布在區域裡的「高山族」(歷史上一直維持著他們傳統的宗教和政治習俗之族群)更加深了區域的多元性。⁴¹以現代經濟標準來說，東南亞是最分隔的當代世界區域，包含全球最快速成長的經濟體(譬如新加坡)以及若干最貧窮國家(譬如緬甸)。政治上來說，東南亞各國從獨立以來，也呈現了包括共產主義、(各種的)資本主義，以及佛教社會主義之體制。不論從哪裡看來，差異都要遠多於相同。

該地區的若干學者因困擾於統一特質的闕如，乃極力尋求可以將區域人民連結起來的足跡。較近代者譬如 **Lea Williams** 強調該地區的「海洋凝聚力」(*maritime cohesion*)，⁴²可是如前所述，世界這部份的真正「海洋區域」其疆界是不一樣的。**Jan Broek** 則以該區域的「殖民」特質為其主要區分點，再加上一些其他的界定特性，譬如原料的出口，⁴³這似乎廣為所謂第三世界所接受。

由於特定的東南亞區別特質極難確定，歐美的歷史學者在過去數十年來努力挖掘「正牌東南亞」(*echt Southeast Asia*)的較獨特之「文化次層」(*cultural substratum*)。⁴⁴**Anthony Reid** 以此為基礎，建立了形塑一個獨特文化最強的個案。⁴⁵他確認了該區域並非與歐洲或南亞屬於同一類型，因為其共同點早已被多樣的外來影響所覆蓋了。⁴⁶不過 **Reid** 論說，從若干共同祖先團體所流傳下來，加上在實質和理念層

³⁹ 見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540-1680*, Vol. I, *The Lands below the Winds*. 印度教後來隨著印度勞工的移入，而又再次回到馬來半島。

⁴⁰ **John Leddy Phelan**, *The Hispaniz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9).

⁴¹ 關於大陸東南亞低地和高山的區分，見 **Charles F. Keyes**, *The Golden Peninsula: Culture and Adaptation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Macmillan, 1977).

⁴² **Lea E. Williams**, *Southeast Asia: A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5.

⁴³ **Jan O.M. Broek**, "Diversity and Unity in Southeast Asia," *Geographic Review*, 34(2) (April 1944), p. 189.

⁴⁴ 見 **Craig J. Reynolds**, "A New Look at Old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4(2) (May 1995), pp. 419-46.

⁴⁵ 學者們曾經猜測東南亞應該有某些被埋藏著獨特的文化足跡，不過沒有人能真正將之掌握。譬如，1944 年時 **Broek** 如此說：「我們甚至能進一步說，如果不是因為外來的衝擊，[東南亞人]彼此之間的差異應該是會較小的。這些衝擊首先來自較先進的東方文明，後來則來自西方世界。」見 **Broek**, "Diversity and Unity in Southeast Asia," p. 186. 而只有當 **Reid** 在 1988 年出版其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之後，東南亞生活方式的概念才明顯浮現出來。

⁴⁶ 譬如見 **Lieberman**, "Local Integration and Eurasian Analogies" 的精闢論點。他認為在近代初期時，

次的密集交換，產生了一個被外來影響掩蓋但未被消滅的共同點。他確認了幾個東南亞的特質，像是女性相對高的地位、從事貿易的傾向(甚至是統治菁英階層)，⁴⁷以及債務關係所牢繫的社會秩序。這些特質在殖民之前較為明顯，而即使到了今天還是可以在越南的漢化文化、菲律賓的西班牙文化，和馬來西亞的伊斯蘭文化裡看得到。⁴⁸

如果我們結合 Williams、Broek 和 Reid 對東南亞特質的論述，那麼我們就自然會想到台灣，好像也可以套用該些論述，不是嗎？台灣一直都與海洋有著濃厚的凝聚力，與航海貿易關係濃厚，也有濃厚的殖民色彩，女性社會地位相對較高(尤其是原住民)，人民的生活亦與債務脫離不了關係。當 François Gipouloux 在論及歷史上亞洲地中海重要的貿易王國以及獨立城市時，⁴⁹也將台灣包含在其中，顯見台灣與東南亞關係之深。

Gipouloux 在論述歐洲地中海七至十七世紀包括熱那亞以及威尼斯在內的海上共和國(*repubbliche marinare*)，以及北海與波羅的海邊的漢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時，指出東亞相對應的獨立貿易都市雖然不多，但還是可以找到一些明顯的例子，除了鄭氏家族統治下的台灣之外，他還挑選了 7 至 14 世紀的蘇門答臘王國三佛齊、15 世紀的馬六甲蘇丹國、15 至 17 世紀為中日貿易中繼站之琉球的那霸，以及位於日本大阪灣的海港堺市。

地中海與波羅的海的自主城市共和國，具有四大特徵：1. 軍事編組的船隊；2. 純為市場運作而無領土野心以控制航線和戰略地點的決心；3. 市民法(*civic law*)傳統的維持和鞏固；4. 各種嘗試與測試過的商法工具。⁵⁰相對而言，東亞的貿易自主都市是否也有足夠的制度安排，以因應貿易體系的需求？我們無法做東西方點對點的比較，不過，這些東亞自主王國/都市因地理位置的優勢，還是對海洋貿易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

若要追溯台灣在海洋史的出現，我們可以往前看西元十世紀的中國五代時期

群島和大陸東南亞的歷史痕跡有顯著的差異，就許多例子而言，大陸東南亞各王國較能與歐亞大陸的其他國家相比擬，而非群島東南亞國家。

⁴⁷ 見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540-1680*, Vol. I, *The Lands below the Winds*, p. 270.

⁴⁸ 若干有名的考古學者從相同的工藝品遺跡，亦支持此區域定位的論點。譬如 Wilhelm G. Solheim II, "Southeast Asia: What in a name, Another Point of View,"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6(1) (March 1985), pp. 144-45 即指出，東南亞之文化特徵包括「建在...柱子上的房子、刺青...、牙齒雕花、嚼包葉檳榔...、以祖先和自然神靈為中心的拜物宗教、性別普遍平等的雙系繼嗣制...、世襲繼承土地，以及以物質文化的特定成分做自我表徵的地方團體。」

⁴⁹ 見 François Gipouloux, trans by Jonathan Hall and Dianna Martin, *The Asian Mediterranean: Port Cities and Trading Networks in China, Japan and South Asia, 13th-21st Century* (Cheltenham and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1), Chap. 4.

⁵⁰ Gipouloux, *The Asian Mediterranean*, p. 53.

(907-960)。當時中國南部地區因王室的瀕臨危機，掌握著極大程度的自主權。佔據福建的閩國則潛心自立，一點一點的準備著，逐漸成為東南亞的經濟成長引擎。我們亦目睹了南漢統治下廣東的快速發展，尤其在冶金生產方面。在南邊後來成為菲律賓的群島，我們看到了盛產金的武端(Butuan)(在民答那峨北岸)，開始以黃金跟中國交易磁器。在爪哇島，經濟重心從中部移至東部。在現在的北越，終於擺脫了中國的控制，開始對南邊的占婆(Cham)發動戰爭。這些衝突因占婆的撤退而結束，並打開了向西的貿易路線，與印度首次接觸，也與海洋佛教國及與伊斯蘭開始接觸。⁵¹

Nicholas Spykman 在其 1942 年的經典著作裡亦提出亞洲的地中海(Asiatic Mediterranean)的概念，此地中海介於亞洲與澳洲，以及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大致呈現一個三角形的形狀，三個角分別為福爾摩沙(台灣)、新加坡，和接近澳洲北端托列斯海峽的約克角(Cape York)。地中海的邊緣包括菲律賓、哈馬黑拉島(Halmahera)、新幾內亞、澳洲北岸、荷屬東印度(印尼)、英屬馬來亞、暹羅、法屬印支半島，以及中國南岸直至廈門以及香港。從中國南岸大量的勞工、貿商和資本向外移動，許多地區的華人中產階級，孜孜矻矻地鑽營於物物交易和西方資本主義體系之間。中國的經濟滲透並未伴隨政治的控制，一方面主要是因為當時中國社會的狀態，另一方面則是中國的缺乏海權。⁵²

從中國大陸南岸伸出了兩個大島，一個是海南島，一個是台灣。兩者最初都非為華人所居住，海南島的原始居民是俚人，而台灣則為南島族群(Austronesians)，也就是說，兩個島的根都是「東南亞」。海南漢化很早，而且長期都是大陸體系的一部分；反之，台灣直到十七世紀時才被漢人占領，而且是來自福建的農民。地理環境上兩島與中國南方很相似，動植物學家都會指出海峽兩邊的動植物群極為類似，都曾出現過象群。中國大陸南岸也曾被熱帶雨林遮蔽，與歐洲的地中海較早開發地區一樣，森林一直在萎縮，只是在穆斯林世界是向西退縮，而在中國則是向南退縮。⁵³

台灣的漢化因為是很晚的事情，所以要論述台灣的「南向」，還是要追溯其根源，也就是中國的南部區域。如前所述，漢人的海外發展是在西元十世紀之後，而海上貿易興盛最早的東亞國家是韓國。在八世紀末適逢中國以及韓國朝廷的積弱，

⁵¹ Denys Lombard 建議我們應研究「網絡與同步」(networks and synchronisms)：區域之間接觸的重建、連結的重解(華人、穆斯林與基督徒)，以及找出同步時間點，從史前的東山文化到城市國家的結束，其間在區域裏同時發生的過程。見 Denys Lombard, "Networks and Synchronisms i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6(1) (March 1995), pp. 10-16; Lombard, *Le carrefour javanais*.

⁵² Nicholas John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7 [1942]), pp. 132-35.

⁵³ Denys Lombard, Trans. Nola Cooke, "Another 'Mediterranean' in Southeast Asia," *Asia-Pacific Journal*, 5(3) (March 1, 2007), p. 5.

與中國之間的朝貢貿易因而縮減，民間的海上貿易隨而繁盛。新羅的貿易商時常到中國沿岸進行交易，並在該國居住下來。他們同時也與日本進行貿易，主掌了東亞的海上貿易。這種積極從事海上貿易的奮勇精神，就工業化前的韓國歷史來說，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當時最有名的人物是張保皋，他控制了與中日漸增的貿易，後因涉入了皇都的政治鬥爭，被刺殺身亡。「他的死亡以及後來其海商帝國的消失，極可能也預示了韓國從中、韓、日間海上貿易高峰的衰落。」⁵⁴

東北亞海上貿易的主控權於西元十世紀時從韓國人轉到漢人手裡，然後於幾世紀後又落入日本人手裡。就跟九世紀時的韓國一樣，日本在十一世紀海商的興起，是因律令制朝廷的衰弱導致地方統治者的興起。⁵⁵當律令制朝廷控制對外貿易的權力消失，在十一世紀時，「部分免政府賦稅與不受法律管轄的莊園內私人港口的出現，給了中國商人一個[取代官方貿易]更吸引人與有利的機會。」⁵⁶日本海外貿易從十二世紀逐漸成長至十七世紀初，那時日本對外貿易額與 GDP 比已經達到西歐的水準，而該國的重商傾向已經與西歐一樣強盛。⁵⁷

琉球是十五至十六世紀興起的貿易王國，它利用與中國朝貢貿易的機會，將取得的產品轉賣到日本和東南亞，從東北亞和東南亞之間的轉口貿易大獲其利。不過，琉球的對外貿易於十六世紀下半葉因日本的直接對東南亞貿易、華人隨著朝廷於 1567 年解除對海商貿易的禁令而開始活躍於海外貿易，以及葡萄牙商人的進入東亞海域而逐漸衰落。⁵⁸琉球於 1609 年被薩摩藩的島津氏所攻克，不過還是持續扮演中日間轉口貿易的角色(見圖一)。

⁵⁴ Edwain O. Reinschauer, *Enn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 (New York: Ronald Press Company, 1955), p. 294.

⁵⁵ 田中健夫，《中世對外關係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5)；轉引自 Hun-Chang Le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e-industrial Trade in Northeast Asi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219 (Koky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Research Unit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in Social Sciences, July 2007), p. 14.

⁵⁶ William H. McCullough, "The Heian Court, 794-1070," in Donald H. Shively and William H. McCullough,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87.

⁵⁷ 日本積極地向東南亞進行貿易。見岩生成一，《鎖國》(東京：中央公論社，1966)；轉引自 Le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e-industrial Trade in Northeast Asia," p. 14.

⁵⁸ 高良倉吉，《琉球王国》(東京：岩波書店，1993)。



圖一 14 世紀末至 16 世紀中琉球王国的海上貿易網絡

資料來源：Gipouloux, *The Asian Mediterranean*, Map 4.4.

在馬六甲陷落於葡萄牙人手中(1511 年)一個半世紀之後，以及琉球商貿勢力衰落後不到一個世紀，出現了東亞海商貿易史上最後一個獨立貿易王國—台灣，効忠於明朝皇帝的鄭成功(1624-1662)和其兒子鄭經(1661-1683)在台灣建立了一個短暫的王國與朝代。鄭成功從廈門和金門港對荷蘭人發動攻勢，因害怕此二基地容易遭受清軍的攻擊，乃趁荷蘭艦隊離開福爾摩沙之際，以 400 艘船艦和 25,000 名士兵對台灣發動攻擊，荷蘭堡壘熱蘭遮城於 1662 年一月被攻陷。鄭氏的勝利結束了荷蘭對台灣 38 年的占領，並聚集了數千反清復明志士。

台灣當時立志成為對整個東南亞做生意的大商場，從中國輸往日本的綢絲會經過台灣，而其鹿皮則輸入日本以製造護胸甲和擋箭牌。⁵⁹鄭成功經常在東海和南海與歐洲商人生意往來，他所建立的海洋帝國是要控制航線，而不是為了保衛領土。此航線從日本延伸至暹羅，通過琉球，並從菲律賓到越南。當他以 38 歲的年齡死於 1662 年時，他正準備要攻擊西班牙在菲律賓的墾殖地。菲律賓有大量的華人口，所以如果當時他的計畫成功的話，將會對滿清產生很大的威脅，這是以大陸領土為基地的帝國強權，首次要對抗華人移民為主的海洋貿易帝國。到了 1683 年，那些明朝遺民因長期困守台灣已經喪失了鬥志，乃被滿清所攻克，次年，台灣成為福建省的一個府。

⁵⁹ 見 John Robert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5), pp. 47-104.

台灣航海王國的崛起

從十一世紀華人的開始活躍於海上貿易，一直到十七世紀鄭成功的開發台灣成為東亞地中海貿易的新據點，可以說是華人在海上絲路達於鼎盛的時期。王賡武在其 1958 年的書裡特別強調南海貿易網絡的重要性，甚至早在中國建立皇朝前(戰國)時期，以奢侈物品像是珍珠和犀牛角為基礎運往印度之海上貿易，就已經值得矚目了。⁶⁰此貿易網絡不只形塑了東南亞文化和政治發展的骨幹，也攸關華南、台灣，甚至日本的文化與政治發展。⁶¹

不過，我們在上面已經討論過，有時候我們必須拋開中國中心論點，才能更清楚地釐清華南地區以至於台灣，在南海貿易甚至整個東南亞的發展上，所扮演的角色。譬如在 1560 年代，當海盜被肅清後，中國明朝政府修改了海禁體系，並發覺到授予華商許可證到海外從事貿易的價值，它也被迫同意了非朝貢歐洲船隻進入中國的港口。同時，日本豐臣秀吉也於 1590 年代派軍攻進朝鮮，對中國明朝為中心所建立的國際秩序帶來極大的挑戰。中日的外交關係因此中斷，直到 1868 年的明治維新之後才恢復。日本白銀與中國絲綢的交易不能再以朝貢或走私貿易來進行，勢需尋求其他的管道。

一個解決辦法，就是透過歐洲國家在亞洲的據點像是澳門、馬尼拉、巴塔維亞(雅加達)以及台灣，做為中日交易之間的中介。從 16 世紀末當日本成為統一的國家起，「南蠻貿易」(日本與西、葡之間的貿易)在日本列島逐漸興盛，歐洲人從自由進入其亞洲據點的華人取得生絲，然後輸入九州和本州的港口，再運回白銀。第二個辦法是，中國商人在向官方申報他們「要與日本以外的國家從事貿易」之後，離開本國前往台灣(當時還未受到中國有效的管轄)以及東南亞的主要港口城市像是馬尼拉、巴塔維亞、會安、紅河港埠、大城(Ayutthaya)和柬埔寨，在那裏與日本商人碰面，當場交換貨物，有時候甚至(違法)赴日本進行交易。日本德川幕府(1600-1867)剛建立時，即對進行貿易出口的商船設立一許可制度，大多數被授與「紅證」的貿商(可能包括許多過去的倭寇)都會赴台灣和東南亞經商。⁶²

當鄭成功從荷蘭人手裡攻下台灣後，福建許多商人紛紛與鄭氏聯手對抗滿清。一方面是獲勝的滿清在 1650 年代採行了非常嚴厲的措施，禁止任何形式的海洋貿易，將福建海岸人口驅往內陸以禁絕他們與鄭氏的任何接觸，並一直對海洋貿易

⁶⁰ Wang Gungwu, *The Nanhai Trade: Early Chinese Trad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58 by the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9.

⁶¹ Erica Fox Brindley, *Ancient China and the Yue: Perceptions and Identities on the Southern Frontier, c. 400 BCE-50 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2.

⁶² Momoki Shirō and Anthony Reid, "Introduction: Maritime Interactions in Eastern Asia," in Fujita Kayoko, Momoki Shiro and Anthony Reid, eds., *Offshore Asia: Maritime Interactions in Eastern Asia Before Steamship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3), pp. 9-10.

持著極為敵視的態度，直到它於 1683 年征服台灣為止。另一方面，鄭氏王朝本身又代表了第一個東亞真正的海洋華人霸權，完全倚賴亞洲區域的貿易以維生。

63

我們從西元十世紀華南漢人在東亞初始的商貿時代現身於南洋開始，追述到十七世紀鄭成功在台灣建立的第一個東亞海洋霸權，凸顯了台灣與東南亞的歷史淵源。首先我們目睹了台灣與東南亞(尤其是印支半島)的漢化過程，此漢化主要是受相當程度經濟自主的華南地區所影響。其次，台灣與東南亞雖都屬傳統的農業社會，但也明顯都高度倚賴海洋貿易，更是原物料的主要出口地區。再者，許多自然因素，像是動植物的種類與分布、氣候季節的變化、颱風與地震的肆虐、地質與礦物等等，都有許多相似的地方。此外，宗教與文化的多元與混雜、種植水稻和食用米飯，也都是兩者共同之處。我們還可以追述另一個面向，那就是性別與家庭。

東南亞與日本、韓國一樣，在近代初之前都有雙系繼嗣、流動族氏家庭體系，以及女性所據相對高的社會地位，這些常受到忽視。根據日本歷史社會學者牧野巽，古時候東亞所有種稻的社會(包括日本、韓國、華南和東南亞)都存在雙系繼嗣體系，女性擁有相當的法律權利。⁶⁴以唐宋時期的中國來說，女性的權力和地位比一般預料的都來得高；一直到唐之前，婚姻通常非為永久性的，女性受到婚姻、家庭和氏族的束縛相當鬆懈，故享有極高的社會地位，這部分是受到游牧文化的影響。到了宋代，雖然穩定的核心家庭已成形，而妻子的倚賴性亦較大，但尤其在華南，女性是享有財產權的。⁶⁵

兩個互動週期的交錯，形塑了台灣在 17 和 18 世紀的社會演變，這兩個週期一個主要是經濟，另一個則為政治。台灣在這兩個世紀裏，主要是處於中國東南海岸區域經濟及其國際連結的軌道內。中國東南海岸經濟與人口的擴張與萎縮，明顯亦對台灣的貿易和開墾產生激勵與壓制的作用。中國東南海上貿易獲利的機會，亦深深吸引了日本和歐洲人，明朝的排外政策促使他們到台灣港口進行貿易。明朝代的週期和衰落則將許多戰爭難民和征服者推向台灣，而清朝的軍隊和官僚最終則將台灣納入版圖。中國政府接著則必須進行台灣的漢人開墾者和平地原住民之間互動的協調工作，並且在 18 世紀時「監督」台灣成為一個漢人農業社會。

中國人口在清帝國鞏固其統治勢力後開始大幅成長，人口的成長乃需要擴大開墾地區，並大規模遷移人口至中國各邊疆地區。十八世紀人口的擴增和農業的開墾，

⁶³ Momoki and Reid, "Introduction: Maritime Interactions in Eastern Asia," pp. 10-11.

⁶⁴ 牧野巽，《支那家族研究》(東京：生活社，1944)；轉引自 Momoki Shirō and Hasuda Takashi, "The Periodiz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in Comparison with That of Northeast Asia," in Fujita Kayoko, Momoki Shiro and Anthony Reid, eds., *Offshore Asia: Maritime Interactions in Eastern Asia Before Steamship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3), p. 22.

⁶⁵ 牧野巽，《支那家族研究》；另見其《近世中国宗族研究》(東京：日光書院，1948)。

挑戰著帝國對邊遠人力和農業開墾的管控能力及財力。然而，人口的增加反而看到政府和軍事官僚成長的縮減，迫使它必須將有限的政府與軍事人力及其預算集中到問題較大的地區。因此之故，台灣這個戰略邊陲地區人口雖少，但卻聚集了大量的官僚人力。⁶⁶不過，要了解清帝國晚期對台灣這樣的邊遠領土之收納以及其土地所有權的分配，還是必須探討其財政上的限制。

由於收稅成本極高、防止稅務人員濫權的困難，以及對苛稅的抗拒，清政府只能將稅賦盡量壓低。這使得政府必須盡量縮減文官和軍事官僚的支出，並倚賴地方仕紳以提供政府服務。儒家文化又重農而輕商，所以稅收大部來自私人的農地。邊疆地區控制成本與農地稅收的差額，即決定了政府是要支持原住民的爭取土地所有權，還是偏袒漢人的農業擴張和新開墾農地的稅收。在台灣，清政府的政策重點明顯是在調解原住民的土地權。台灣是未開發的邊疆地區，沒有多少接受儒家教育的仕紳協助政府收入和地方的控制，所以清政府必須投入較多的軍力，並輔以較多的官僚以統治此戰略邊陲。⁶⁷

古典政治經濟學體認到政府並非只是被動地適應，它們也會轉變其環境。政府從取得並花費租稅收入，並界定財產權，他們是強力形塑一社會的經濟行為者。⁶⁸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獨立於政治和朝代週期，而又與其互動的經濟和人口週期。而且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許多歷史時代裡體會到「毀滅模式」的改變，同時政府的掠奪策略亦凌駕於「生產模式」的改變。做為研究歷史和社會的政治經濟學拒斥經濟的化約主義，以及脫離社會因素的政治和文化史。

在十六世紀之前台灣還未漢化並幾乎被完全孤立，而且中國史書裡也從未提及台灣，這確實是不可思議的事。台灣只離開福建一百哩左右，雖說福建也直到唐代時才被納入中國版圖，但過去一千年來，福建商人即一直與東南亞、琉球和日本進行貿易。而早期的中國歷史紀錄鮮少提及台灣，考古和族群資料亦證實貿易路線大部都略過台灣。⁶⁹有些學者認為台灣的受孤立與台灣海峽危險的風浪有關，不過漁人、海盜、商船甚至中國海兵都時常有辦法克服此障礙。離台灣西岸僅25哩的澎湖在十三世紀時就已被中國漁民所占住，其後並斷斷續續往返於該處。觀諸宋朝航海技術的進步，華人要到達澎湖或台灣並不是很困難的事。所以，台灣的孤立於中國歷史之外，並不在於到不了，而是缺乏吸引力之故。台灣的天然資源並不是那種可以用來生產多有價值的貿易物品者，而且該島也不是甚麼貿易王國所在，或工藝製品的生產中心。加之，台灣獵人頭的原住民更使人望而卻步，亦阻礙了貿易的發展。因此，數世紀以來，除了偶然的探險者或與其他以物易物

⁶⁶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pp. 3-4.

⁶⁷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pp. 5-6.

⁶⁸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p. 6.

⁶⁹ Ibid.

的漁民之外，沒有人與其居民有何接觸。直到十六世紀東亞海上貿易的擴大和海盜的猖獗，台灣的孤立才漸消除。

從十六世紀起，華人與台灣的互動持續增加，福建漁民和中國與日本海盜在十六世紀時經常造訪台灣海岸，並從事一些貿易，大部分以鐵和鹽與原住民交換鹿皮和鹿角。十七世紀因中國朝代更迭，許多難民在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及後來效忠明朝遺民的贊助之下赴台墾植。在十八世紀，許多無地可種的人民從中國東南海岸湧入台灣，移入台灣的漢人主要來自福建省的兩個府(漳州和泉州)以及廣東北部的幾個府，後者以客家人為主。這些移民傾向於附屬相同族系或方言的會社。⁷⁰

如前所述，台灣因不具吸引人的貿易財，所以自古並不受中國的貿商所青睞。不過，它所具有的海洋戰略地位，卻是很晚才為人所發覺。上面提到因明朝中國對日本的禁運，使得台灣轉口港之有利的地位，乃被充分地利用。而另一個發現台灣利用價值的是荷蘭人。

荷蘭於十六世紀末脫離哈布斯堡王朝的掌控，成為一獨立於西班牙的共和國，並將輸入里斯本的亞洲商品轉出口至歐洲各地。可惜此高獲利行為於 1580 年因葡萄牙王室為西班牙所控制而受到威脅，菲律賓二世禁止荷蘭人進入里斯本，迫使他們必須到香料貿易的源頭以取得供貨。他們於 1595 年繞過好望角並到達分隔爪哇和蘇門答臘的巽他海峽，以及爪哇西岸的萬丹(Bantam)。此第一次探險之後又有若干次的探索行動，荷蘭人於 1597 年第一次跨越來到東印度群島，而 1598 年幾次嘗試經由南極以發現航道的活動均告失敗。1599 年荷蘭人來到班達(Banda)，1604 年他們將葡萄牙人逐出安汶(Ambon)與蒂多雷(Tidore)，最初獲得想要擺脫葡萄牙人掌控之當地人的協助。他們結束了葡萄牙人自 1511 年以來對東印度群島的統治。

為了避免荷蘭航商彼此之間的價格戰，並且加強荷蘭與葡萄牙的競爭力，1602 年乃創立了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⁷¹VOC 有兩大目的，第一是與東亞貿易，第二是與該新共和國的兩個敵人(西班牙和葡萄牙)打仗。因此它被賦予的任務是：進行外交協商、與地方政權簽訂條約、從事軍事行動。就體制來說，VOC 是國內之國，它以軍隊支撐的貿易政策，就是要強勢取得香料貿易市場。這是由支薪的政府官員所執行的企業策略，而非為自己圖利的商人。VOC 比英國東印度公司(EIC)更勝一籌：「在每一個場域，英國人來得較晚而且變得較弱。每次他們的商船載了貨並運回國時，他們都要看荷蘭官員的臉色，因為後者的城堡和戰艦很快就統制了該區域。」⁷²

⁷⁰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pp. 7-8.

⁷¹ Gipouloux, *The Asian Mediterranean*, pp. 119-20.

⁷² Vincent C. Loth, "Armed Incidents and Unpaid Bills: Anglo-Dutch Rivalry in the Banda Islands in the

VOC 無疑是這個時期最大的企業，雇用了數萬的人力。在十七世紀中葉，它的商業影響力從馬來半島伸展至錫蘭，並從好望角伸展至台灣。VOC 並在波斯、暹羅、日本和韓國有轉口港和工廠的網絡。荷蘭人在 1618 年進駐雅加達，翌年該改名為巴達維亞的城市成為荷蘭在亞洲的總部。荷蘭人從這個東南亞的定錨點，進行對中國貿易，不過他們僅有的兩個進入點—澳門和馬尼拉，一個為葡萄牙所控制，一個為西班牙所持有，因此只能選擇台灣為據點，於 1624 年在當地設立了商場以與中國貿易。此市場不只適合與中國交易，也適合對日貿易，所以商機極大。該島居於進出馬尼拉的戰略位置，北部地區還曾於 1624 到 1642 年被西班牙所占領，荷蘭人於 1624 年開始進駐，並於 1642 年將他們逐出淡水、基隆地區。

在台灣的 VOC 大大阻礙了西班牙與澳門的交流，它的目的就是要滲透進獲利極大被稱為「國家貿易」的東亞區域內貿易，或甚至將其整個攫取以取得自己最大的利益，東亞區域內貿易量事實上比所有企業與與它們自己母國的貿易量還大。在 1637 年到 1700 年間，VOC 在交趾支那(Cochinchina)與東京灣開拓了貿易據點以與葡萄牙競爭，它在南印度、孟加拉、柬埔寨、越南、緬甸、中國、馬六甲和印尼群島均設有辦事處。⁷³

荷蘭人在台灣的事例給了我們一個反證，也就是在十七、八世紀歐洲追尋重商主義的強權，以政治力利用像 VOC 這樣的獨佔企業，造成政府嚴重干預市場的反常現象。Adam Smith 在《國富論》裡分析東印度公司，他不是診斷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而是診斷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⁷⁴這是一個掠奪性的政府，將生產性的商業轉換為非生產性的財富移轉，從利潤的追求轉變為所得的追求。此經濟負擔並非獨佔公司所致，而是政府所支持之企業強制性的掠奪行為。荷蘭對台灣原來並無據為已有的野心，後因與當地居民的衝突，乃於 1636 年制定政策分批發包土地給漢人耕種，並從中國大陸引進勞工以開墾土地。然而，它卻又橫徵暴斂，以低價收買移民的農作，在巴達維亞也如法炮製，引起漢人的反抗暴動。⁷⁵

荷蘭在台灣的做法，驗證了政府為一必需之邪惡(necessary evil)的說法，正如 Douglas North 觀察人類在進入固定農業之後一萬年來的發展，歷經無窮的戰亂、屠殺、剝削、奴役與集體謀殺，為了經濟進步，如果要人民在政府(不論是多麼

Seventeenth Century," *Modern Asian Studies*, 29(4) (October 1995), p. 709.

⁷³ Manguin, *Les Portugais sur les côtes du Vietnam et du Campa*, p. 7; 轉引自 Gipouloux, *The Asian Mediterranean*, pp. 124-25.

⁷⁴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1776]), p. 741. 見 Gary M. Anderson and Robert D. Tollison, "Adam Smith's Analysis of Joint Stock Compan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0(6) (December 1982), p. 1249.

⁷⁵ Gipouloux, *The Asian Mediterranean*, p. 100.

地剝削)與無政府之間做一選擇的話，他們還是會選擇前者。⁷⁶台灣在鄭成功以及後來滿清接手統治之下，我們都目睹了此必需的邪惡。

自從進入商貿時代以來，中國朝廷即一直把外貿視為國家所專斷，其政策執行者對利潤一點也不感興趣。事實上，他們並不在乎與朝貢國家之間貿易的盈虧，因為(朝貢)貿易所依據的原則是「給多而取少」，外國貿易特使停駐京城期間，往往收到慷慨的犒賞，以換取他們的政治效忠。朝貢貿易是以政治利益換取經濟利益，明朝廷得到前者，而朝貢國家獲得後者。令人感到矛盾的是，中國的朝貢貿易以及對民間海洋貿易的禁止，迫使大批的漢人移出至東南亞。⁷⁷

此商業結構對海上運輸有極大的影響，它決定了貿易網絡的形態並因此造就了幾個大貿易中心，像是寧波、廈門和廣東這些朝廷中央監管能力較差或較寬鬆的地方。最終，許多漢人團體基於利益考量乃外移並永久定居在國外，以做為朝貢貿易的中介，從事水手、翻譯和貿易代理等工作。這亦解釋了東南亞華人貿易網絡的出現，而華南的方言(福建或廣東話)即成為其通用語言。這種中央與地方對國際貿易所持心態的差異，以及華人在南海貿易所居地位的日趨重要，乃促使朝貢貿易這種單邊的、上下從屬的以及儀式性的貿易形態，逐漸轉變為互惠式的形態。

78

東亞內部貿易(南海貿易)並不只是歐洲經貿活動的延伸，而是連結曼谷、檳城、馬六甲、新加坡、西貢、廣東和馬尼拉所形成的緊密海上貿易網絡。在 1683 年清廷征服了台灣並解除了海禁之後，華人在南海的貿易活動蓬勃發展。⁷⁹到了十八世紀末，東南亞許多本國的貿易商(country traders)開始出現，他們決定與華商做生意。同時，其他商業團體也介入進來，像是移居廖內島(Riau)的西里伯斯(現為蘇拉威西島)的武吉士人(Bugis)、武士以及企業家控制了新加坡海峽和蘇祿王國，使得情況變得更為複雜。南海已經成為華人企業的貿易樂園，就如同王賡武所形容：東南亞的華商是「沒有帝國的商人」(merchants without an empire)。⁸⁰

現在每人都有攫取海洋與商業空間的機會了，因為荷蘭東印度公司被逐出了台灣，

⁷⁶ Douglas C.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 1981), p. 24.

⁷⁷ Chang Pin-tsun, "The First Chinese Diaspora in South-East Asia," in Roderich Ptak and Dietmar Rothermund, eds., *Emporia, Commodities, and Entrepreneurs in Asian Maritime Trade, c. 1400-1750* (Stuttgart: Steiner Verlag, 1991), pp. 14-20.

⁷⁸ 另一方面, *The Asian Mediterranean*, p. 102.

⁷⁹ 見 Leonard Blussé, *Strange Company: Chinese Settlers, Mest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 (Dordrecht: Foris); Jennifer W. Cushman, *Fields from the Sea: Chinese Junk Trade with Siam during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⁸⁰ 見 Wang Gung-wu,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1), pp. 70-101.

它不再與柬埔寨和東京保護國(Tonkin)直接貿易，它與日本的關係受到德川幕府 1685 年所訂條件的限制；⁸¹同時，荷蘭也喪失了它在馬六甲鄰近的吉打、雪蘭峨(selangor)和丁加奴(Trengganu)等王國。最後，有大量的漢人殖民者到暹羅種稻，到爪哇種甘蔗，到廖內與汶萊種鉤藤(gambier，用以製革)和胡椒子；他們甚至到馬來半島採掘白鐵。⁸²可是，清廷在取得台灣之後，在對外貿易上卻乏善可陳。

清廷雖佈署了大量的官僚人力於台灣，但因當地居民的抗拒以及原住民的兇悍難擋，真正能控制的地區不到全島的一半。歐美國家直到 1860 年代才開始對台灣感到興趣，最先是英國與美國，有零星的船隻來訪，並有少數選擇在台灣南北兩端居住下來。清廷對歐美國家戰爭的失利，被迫開放港埠，也包括了淡水與基隆，外國商船陸續進來，為了管理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乃於 1866 年設置了海關。雖然清廷並未真正遵守條約的要求，但到了 1870 年代，台灣對外貿易額還是大幅超越了 1860 年代。⁸³

日本於 1874 年首次由樺山資紀和水野遵帶領探險船來到台灣，並經由陸路從基隆走到蘇澳。日本的來訪激起清廷的關注，巡撫沈葆楨來台，雖未大興建設，但也將原有基礎建設做了一番整修。⁸⁴1884 年中法戰爭展開，法軍在占領台灣九個月後悄然撤退，承認它的失敗，也凸顯台灣居民的頑強，以及台灣易守難攻的地理特性。⁸⁵日本的覬覦以及法國的失利促使清廷重新體認到台灣的價值，在巡撫劉銘傳的努力整治之下，台灣從 1886 至 1894 年間，經濟蓬勃發展。⁸⁶

可惜好景不常，台灣在 1895 年正式落入日本之手，日本的長期經營終於獲得成果。台灣在日本統治的前六年，成為一個出口機器，出口以樟腦和茶為大宗，三分之二以上輸往中國和日本，其他則以輸往美國最多，其次為英國和德國。過去台灣扮演轉口貿易的角色倒轉了過來，現在則是經由這些國家再轉賣至其他國家。

87

結語

⁸¹ 日本德川幕府在十七世紀所採行的貿易保護政策之一，就是 VOC 必須離開原來在平戶島的貿易據點，而轉移到出島，每一個新上任的 VOC 主管都必須進謁幕府。見 Gipouloux, *The Asian Mediterranean*, p. 90.

⁸² Gipouloux, *The Asian Mediterranean*, p. 151-52.

⁸³ James Wheeler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History, People,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Prospects; Tea, Camphor, Sugar, Gold, Coal, Sulphur, Economical Plants, and Other Productions* (New York: Macmillan, 1903), pp. 172-208.

⁸⁴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pp. 208-10.

⁸⁵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Chap. 16.

⁸⁶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Chap. 17.

⁸⁷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pp. 624-46.

因時間的限制，這是一個尚未完成的文章。

本文想要論述的是，廣義而言，台灣的南向應追溯至一千年前，當漢人從中原大量南遷，並登上方興未艾的商貿時代之舞台。與歐亞大陸另一端的地中海一樣，東亞這一端也出現了另一個地中海，而且與叱咤於前者的熱納亞與威尼斯等城市共和國一樣，東方的地中海也有它獨領風騷的商貿都市，台灣是其中之一。而我們若要看清全貌，就要先擺脫歷史上大一統中國的政治假象，因為海洋貿易是一種跨國的(transnational)，而非國際的(international)經濟活動。台灣的出現在此舞台，是因歷史上中國朝代更迭、政策轉變而促使眾多漢人移向南洋發展的結果。

華南漢人的南向移動，成為東南亞文化與經濟生活的重要組成成員，而台灣是此南向趨勢下的一個產物，同時也是此南向隊伍裡的隊員。我們只有從這個隊伍的走向與特性深入了解，才能真正了解台灣在東亞地中海所扮演的角色。台灣與東南亞這個四不像的「區域」一樣，都因東西貿易的蓬勃發展而崛起於世界舞台，都混雜著許多不同的文化與族群，也都因處於商貿的戰略地位，曾經受到世界列強的覬覦與殖民。如果說台灣與新加坡是 Spykman 三角形亞洲地中海的兩個角，那麼在此兩個角之間發生了許多影響深遠的歷史過程。

台灣長時間被東西海洋絲路所忽略，一來因其地理環境險惡所致，另一方面則與歷代中國政府的政策脫不了干係。而也因為中國的政策，使得荷蘭人發現台灣的戰略價值，並把它和歷史上的南向潮流連結在一起。鄭成功力圖建立台灣成為第一個海洋漢人王國的壯志未酬，歐美國家與日本則嘗試從滿清手裡將台灣拉拔再次成為海洋商貿名城，最後是日本達成了素願。只不過，台灣已經從過去的轉口港，轉變為出口貿易的機器。它也曾近代因另類的轉口貿易一代工出口，而左右全球貿易的走向。展望未來，它將在商貿世紀持續南向的趨勢裡，扮演甚麼樣的角色呢？

* 本文為未完成之初稿，請勿引用。